

五代时期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五代时期,地处江南的杨吴、南唐和吴越三国,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在五代十国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政治体制方面,杨吴向南唐的和平过渡,是杨吴后期执政者徐温、徐知诰父子借杨吴旗号,通过变易其王国政体为帝制而逐步实现的。南唐政治抱负经历由保守到扩张、再趋向内敛的过程,而吴越则始终以奉中原王朝为国策。在经济领域,三国均以保境安民为主旨,力促劝农,重视屯田,共同为经营和开发江南做出贡献。

关键词:杨吴;南唐;吴越;政治体制;财政经济

中图分类号:D6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3-0019-06

五代时期,江南大部地区,即地跨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的江淮、太湖之间地区,形成杨吴和南唐的禅代更替;太湖以东和浙江地区形成吴越的割据。史学界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笔者注意到,江南三国政局相对稳定,统治集团普遍奉行保境安民政策,注意辖境内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成就显著。杨吴和南唐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南唐和吴越实现长期和平共处,这与五代更替的中原和其它割据政权内乱纷争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因此,与中原五代和其它割据政权相比,江南三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历史地理单元,理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可是,史学界对此似尚无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经济做简要归纳,以期增加学术界对五代十国研究的学术认知。

一、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

杨吴自杨行密立国,一直奉行唐末节度使制,直到902年受唐室册封为吴王始确立王国政体。杨行密之后,杨吴权柄被徐温窃取。为实现称帝愿望,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逐渐变更杨吴的王国政体为帝制,从而为南唐帝国的和平禅代奠定了基础。南唐自烈祖李昇即徐知诰建国,历元宗李景、后主李煜三世,政治性格变化无常。烈祖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元宗政治抱负膨胀,试图利用

楚、闽两国内乱扩张疆土,结果先后失败,并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失去江北土地。因此,后主李煜时代重新转为内敛。而吴越自钱鏐开国便奉行向中原王朝进贡称藩的政策,历五主始终如一,政治性格平和。

1. 从杨吴王国政体到南唐帝制的嬗变

徐温在和张颢共同弑杀杨行密的继承人杨渥后,借口为杨渥复仇,除掉张颢,立杨隆演为吴王。隆演立,温遂专政,迁升州刺史,治舟师于金陵,以金陵为基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天祐十二年(915年),杨吴封温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始就镇润州,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温城升州,建大都督府,篡立基础已基本铸成。

但是杨行密始终没有称帝,因此徐温为实现篡位称帝目的,不得不先借用杨吴旗号,通过逐步改易杨吴政治体制,迫使已成为傀儡的杨吴从王国演变为帝国,逐步实现称帝夙愿。天祐十六年(919年),徐温逼迫杨隆演即皇帝位。但是杨隆演只答应即吴王位,“建国改之,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封东海郡王”^{[1]760-761}。杨隆演拒绝帝位,恐怕是想延缓徐温的篡位步伐。但是这已经是独立于中原王朝的王国,向帝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他的继任者杨溥则终于无法抵挡徐温的压力,被迫即位为帝。

在徐温的政治生涯中,依靠的是骆知祥和严

收稿日期:2012-03-14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可求的辅佐。“温客尤见信者,惟骆知祥、严可求,可求善筹画,知祥长于财利,温尝以军旅问可求,国用问知祥,吴人谓之严、骆。温亦自喜为智诈,尤得吴人之心”^{[1]761}。特别是严可求建议徐温“当先建吴国以自立,温深然之,留可求参总庶政,兼草礼仪”^{[2]51},为徐氏父子的篡位事业居功至伟。于是,徐温从严可求议,以节度使难以节制地方镇将为由,劝杨隆演称帝。“徐温自以权重位卑,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请建吴国,称帝而治。

可徐温居然在此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突然病故,未竟的事业最后由养子徐知诰完成。杨吴顺义七年(926年)十一月,杨溥即皇帝位,改元乾贞,“以徐知诰为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询辅国大将军、金陵尹,治温旧镇”^{[1]758}。乾贞七年(935年),杨溥改元天祚,“知诰进位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封齐王”^{[1]759}。天祚二年(936年),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之后又以其子景通为太尉、副元帅,宋齐丘徐玠为元帅府左右司马。是年十一月,杨吴“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次年三月,徐知诰“始建齐国,立宗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曰宫城,厅堂曰殿,以左右司马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为内枢判官,周廷玉为内枢使,自余百官皆如天子之制”^{[2]73-74}。天祚三年(937年),“杨溥逊位于昇,国号大齐,改元为升元,建都于金陵”^{[3]1786}。

历史上通过逼迫前朝禅让而夺取帝位以实现朝代更替者史不绝书。但是先通过迫使前朝为帝,使之成为自己日后称帝基础者,唯此一例。除了节约政治成本的考虑外,徐氏父子或许是想使自己的篡位称帝更具有合法性。

2. 南唐与吴越的政治性格

(1) 南唐

天祐九年(912年),“徐知诰以功迁昇州刺史,辟洪州进士宋齐丘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翊专主谋议,以牙吏要仁裕周宗曹侬为腹心”^{[2]43},构建起以宋齐丘为核心的幕僚辅佐班底,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

作为徐温养子的徐知诰,能最终继承徐温的事业,得益于徐温嫡子、其最大政治对手徐知训的无能。“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1]765}。可他一反徐知训所为,“事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很以俭。以王命尽蠲天祐

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託。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2]50},逐渐收得人心。特别是徐知诰利用中原动乱之机,虚心求贤,网罗四方人才。“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诰豫使人于淮上资以厚币,既至,糜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沓至者无虚日”^{[2]186}。结果,朱瑾袭杀徐知训,使徐知诰毫无代价地成为徐温的继承人。

徐知诰建国后改名李昇,是为南唐烈祖。李昇执政以保境安民为立国之本,政治性格持重。史言:“帝生长兵间,知民厌乱。诸臣多言:陛下中兴,宜出兵恢拓旧土。帝叹息曰:兵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由是在位七年,兵不妄动”^{[2]201-202}。李昇对长期与杨吴对峙的吴越采取和平共处政策。“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由于李昇“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1]768},南唐国势因此走向极盛。

李昇时代政治清明,“令外戚不以辅政,中官不得预事,死国事者给禄三年,皆他国所弗及”,官僚集团风气严整。史言:“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专典机密,与中书侍郎严续皆忠直无私”^{[4]9302}。

南唐至元宗李景继位时,国势达到极盛,成为富甲一方的江南大国。“景僭号之后,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雄据一方,行余一纪。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可李景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父子继承法则,改易为兄弟相及,引来不必要的政治波动,“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枢前设盟约,兄弟相继”^{[3]1787};另一方面改变李昇的保境安民国策,试图借楚、闽两国内乱渔利,贸然介入两国政争,结果既不能并吞湖南,又在与吴越争夺福州的斗争中失败,反而耗费巨大财力,导致国库空虚,之后又在与北周的战争中丧失江北土地,国势大衰。

特别是李景时代政治风气大变,李景所重用的一班文臣多为好大喜功却又营私舞弊之徒,朝政因而日益败坏。“景以冯延巳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梦锡直宣政殿,专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1]769-770}。结果,南唐

朝堂出现激烈党争,影响国祚深远。“齐丘、觉与冯延巳延鲁李征古魏岑查文徽为一堂,熙载与孙晟常梦锡萧俨江文蔚李德明为一党”^{[2]295}。前者好大喜功,鼓动元宗改变烈祖保境安民国策,介入中原与邻国事务,以图扩张疆域,伸张所谓唐室正统权威。

后主李煜被迫内敛国威,“嗣位之初,属军兴之后,国势削弱,弩瘦空竭,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余年”^{[2]256}。李煜还于北宋乾德五年(967年),“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1]799},放弃对所谓唐室正统地位的追求。

(2) 吴越

后唐建立后,钱鏐“遣使贡献,求玉册。庄宗下其议于有司,群臣皆以谓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韬尤为不可,既而许之,乃赐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镇海等军节度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属皆称臣,起玉册、金券、诏书三楼于衣锦军,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1]840}。求玉册之举本为僭越,但后唐无力干预,也只好默许。

表面上,钱鏐的王国政体仍行中原王朝藩属之礼。但是天宝元年(980年),“王以中原丧乱,改元天宝,私行于境中,既而复通中国,或讳而不称”^{[2]1082},则行独立王国之实。特别是天宝十六年(922年)受后梁册封为吴越国王,“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将吏皆称表疏,称吴越军而不言军……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2]1096}。这些都是对自身实力充分自信的反应。

直到其子元瓘继位后,才“去国仪,用藩镇法,仍遵中朝年号称长兴三年”^{[2]1120},恢复藩臣之礼。

吴越对中原王朝的朝觐坚持遵守,在各奉中原为正朔的割据政权中,奉事最勤。“吴越自唐末有国,而杨行密、李昇据有江淮。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飘溺其使”。不论五代王朝如何频繁更替,“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1]843}。吴越向中原进贡,不计成本,更代不懈。史言:“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王人一至,所遗至广,故朝廷宠之,为群藩之冠”^{[3]1774}。

二、江南三国的财政经济

1. 江南三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杨吴、南唐和吴越三国均以劝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经过几代君主的不懈经营,江南地区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形成鲜明反差。

(1) 杨吴

杨吴建立者杨行密以一介武夫开创横跨江淮的江南大国,不断战胜实力强大于己的孙儒等割据势力,依靠的是招抚流离、恢复农业经济的劝农政策。史言:“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太祖初至,赐予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非公宴,未常举乐。常服故时补绽衣于内,自言不敢忘本。轻徭薄赋,招抚流移,未及数载,几复成平之旧”^{[2]29}。杨行密军兴之始,“用度不足,太祖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高勛上书:“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尽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换言之,高勛劝杨行密通过对外发展贸易,对内劝农兴业,建立稳定的经济基础。经过杨行密的努力,杨吴形成“自杨氏建国,抚有江淮,比他国最为富饶,山泽之利,岁入不资”^{[2]442}的繁荣局面。

杨行密去世后,杨吴的实际统治者徐氏父子继续其劝农兴业政策。特别是徐知诰,虚心采纳宋齐丘建议,扭转了杨吴经济中的重商倾向。顺义二年(922年),杨吴政权“命官与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文,下田一顷税钱一贯五百文,皆输足陌见钱,若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以为率守”。员外郎宋齐丘指责这种税收货币化倾向,认为这将导致民间弃农慕商的恶果:“江淮之地,自唐季以来,为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甿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将兴贩以求之,是教民弃本而逐末耳”。他建议“乞虚升时价,悉收谷帛本色为便”。为此宋齐丘请求提高家庭纺织品价格以抑制货币化倾向:“是时绢每匹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请匹绢升为一贯七百元,紬为一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皆足钱”。同时他还“请蠲丁口钱”。朝议沸腾,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官员纷纷抱怨,“喧然沮之,以为如此则县官岁失钱亿万计”。宋齐丘则以“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

耶”加以驳斥。徐知诰对宋齐丘加以肯定,认为“此劝农之策也”。结果,“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2]58-59}。此外,汪台符也请求“括定田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官授盐一斤,谓之盐米,入仓则有余米”。此议影响深远,以至“南唐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为三等,科其均输,以为定制。又货鬻有征税,舟行有力胜,皆用台符之言云”^{[2]142}。

(2) 南唐

南唐建立后,烈祖李昇力促劝农。升元三年(939年)四月,他下诏称:“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以租税”。升元四年正月,“诏罢营造力役,毋妨农事”^{[2]194-195}。

立国之初,“金陵数大水,秦淮溢,东关尤被害,(刁)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2]306}。除兴修水利外,南唐农业最大的举措是元宗李景时代推行的屯田制。不过,虽然统治者动机良好,却最终弊端频出。保大十一年(953年)十月,“筑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诏州县陂塘湮废者皆修复之。于是力役暴兴,楚州常州为甚”。南唐屯田虽以边境州郡为重点,但波及范围甚广。“帝使近侍车延规董其役,发洪饶吉筠州民牛以往”。由于元宗时代吏治腐败,结果“吏缘为奸,强夺民田为屯田,江淮骚然”^{[2]220}。元宗被迫于保大十四年(956年)十月,“诏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2]227},试图改良弊政。由于车延规的苛政使楚州人“不堪其苦,群起为盗”,元宗派徐铉“乘传巡抚”。徐铉“辄罢屯田,切责内臣不少贷,又捕得贼首,即斩于军前”^{[2]401}。屯田实边本为时局使然,历史经验也证明卓有成效。但南唐屯田居然流于苛政,其实与土地分配不均有关。如李平就上书“请复井田法,豪民有买贫户田者,勒令还之”^{[2]341}。直到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后主李煜“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廩,诸朱胶牙税视是”^{[2]241},把屯田事务彻底废弃,而重新纳入日常州县行政范围内,这项事倍功半的事业才最终完成使命。

(3) 吴越

吴越国也对江南的农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钱元瓘继位伊始,即宣布“除民田荒绝者租税”^{[2]1120},以示劝农。钱俶于乾祐二年(949年)“募民能垦荒田者,勿取其税,由是境内

无弃田”^{[2]1150}。

与杨吴和南唐相比,吴越对江南经济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修筑海塘,治理海水倒灌这一困扰浙江农业的痼疾。天宝三年(910年)八月,吴越国“始筑捍海石塘,塘外植浼柱十余行,以折水势”。塘筑成后,钱镠又组织军民“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2]1085-1086}。其二,开发太湖以东地区。天宝八年(915年),吴越“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2]1090}。以上水利设施的修筑使太湖以东地区初步形成排涝泻洪体系。钱俶继续前代对太湖以东地区的开发,“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2]1150}。

2. 江南三国的财政制度

(1) 税收等财政收入

前文已述,杨吴在徐知诰执政时代,税收制度的变化对劝农政策的影响。至南唐,杨吴税法大体沿袭。升元五年(942年)十一月,“定民田税”^{[2]198}。但是,由于元宗时代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以至兵部尚书“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4]9314}。结果,部分税种由于元宗时代财政状况恶化而流于苛税。如“升元之初,括定民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于官廩,授盐二斤,谓之盐米”。此税本是与盐务配套的税种,但是自从“淮甸盐场皆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以为定式”之后^{[2]231},便流于苛税。此外,钱与帛绢的折变,也会影响税收。后主时期,“夏赋准贡见缗,民以变直折阅为苦”。永新制置使李元清“奏请纳帛一匹,折钱一贯,为定制,又常随宜科率,民甚便之”^{[2]422}。南唐自除帝号向后周和北宋称藩,也开始接受中朝接济以渡荒年。这也应该被视作一项财政收入。如开宝元年(968年),南唐“境内旱,宋饷米麦十万石”^{[2]245}。开宝六年(973年),“江南饥,宋馈米麦十万斛”^{[2]247}。

吴越王钱镠虽然爱惜民力,但是赋税仍然十分沉重。如宁海县令陈长官“会王命增州县赋税。长官上书极谏,王大怒,逮之狱。长官以死争之得免。宁海故称剧县,租税视诸邑为独轻者,皆其力也”^{[2]1239}。吴越虽然经济繁荣,但由于北方中原王朝朝贡压力,为维持偏安局面,被迫向中朝

奉以重贡。加之统治集团日益骄奢淫逸,结果到吴越中后期,税收逐渐沉重。史言:“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繆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1]843}。吴越基层税收单位为场,如乾德五年(967年),“都品务文朗副贰陈绍珠等率安国县南新宁善新登广陵铜岷乡众,乞以五乡人户别置一场,就彼征科输送为便。王是之,命特置南乡场,入其赋”^{[2]164}。

(2) 俸禄

杨吴、南唐俸禄有月俸和食邑两种。前者如乾贞元年(926年),徐知诰以柴再用被御史弹劾事,“固请夺俸一月,以肃朝纲”^{[2]63}。又如鲁崇范“复守廉俭,惟以月俸自给”^{[2]413}。后者如宋齐丘“封青阳公,食青阳一县”^{[1]770}。又如楚马希萼乞师于南唐,元宗“诏加同平章事,赐以鄂州今年租税”^{[2]216}。南唐俸禄的来源有禄廩,如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后主李煜“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廩,诸朱胶牙税视是”^{[2]241}。吴越俸禄不丰,“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禄给甚薄,罕能自济”^{[3]1774}。

(3) 财政机构

南唐沿袭唐代,以营田使、三司使管理财政,如严续于元宗时“拜中书侍郎兼三司使”^{[2]323};严可求曾在杨吴徐温专政时期任营田副使^{[2]137}。但是,南唐因“时以军兴,百官政事往往归枢密院”^{[2]324},由枢密院处置财政事务。南唐宫廷财政机构为内帑。如开宝二年(969年),韩熙载“请捐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2]245}。内帑后改称德昌宫,如刘承勋“迁德昌宫使。德昌宫者,故内帑别藏也”^{[2]442}。

(4) 货币

江南三国重视使用货币工具调节经济,铸币

规模很大。三国“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岁铸钱;池州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杭州置保兴监铸钱”^{[3]1949}。

南唐元宗李景介入楚、闽内争,轻启战端,使财政开支剧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七月,“景困于用兵,钟谔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1]777}。此大钱寻因钟谔政治失意而废。不久,韩熙载又“请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通钱之一”。但是是年十二月即“罢铸大钱”。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始铸铁钱”^{[2]232-233}。以上铸钱举措无非是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弥补财政收支不足,但兴废随意无常,使货币秩序更加混乱,从而深刻影响到后主时代的经济秩序。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后主李煜“始用铁钱,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当十”^{[1]778}。可见,南唐货币秩序已陷入恶性循环中。正如乾德十年(972年)十一月左仆射殷崇义所言:“泉布屡变,乱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资,则日益思乱”^{[2]244}。

吴越的货币秩序相对稳定。因为吴越对货币信用十分看重,始终不敢贸然开铸新币。直到钱弘佐于开运三年(946年)才“议铸铁钱”^{[2]1139}。但是遭到王弟牙内都虞候钱弘亿反对。钱弘亿指出铸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禄赐有常,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2]1205}。总之,他认为当前铸钱会使本来运转正常的经济秩序出现波动,特别是现行货币信用尚佳,一旦贸然铸新币如造成信用危机将得不偿失。钱弘佐经慎重考虑,此次没有开铸新币。但是,巨额财政赤字迫使钱俶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正月,“始议铸钱”^{[2]1156}。

通过对五代时期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研究,旨在恢复当时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有益的资料。

参考文献:

- [1]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清]吴应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A Study on Political System and Finance and Economy of Three Kingdoms in the Southern Changjiang Ri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 - Dynasties

WANG Ming-qian

(Maxism Institu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 - Dynasties, Yang - Wu kingdom, South - Tang kingdom and Wu - Yue kingdom in the Southern Changjiang River, as an independent geographical unite, possessed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asphere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from Yang - Wu to South - Tang realized gradually by transforming kingdom system into emperor system under the control of Xu - Wen and Xu Zhi - Gao. In the asphere of economy, The three kingdoms devoted to developing agriculture for engaging in Southern Changjiang river.

Keywords: Yang - Wu kingdom; South - Tang kingdom; Wu - Yue kingdom; political system; finance and economy

(责任编辑:李 军)

(上接第 18 页)

参考文献:

- [1] 中央办公厅.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资料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8.
- [3]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4.
- [4]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李修建,张云江,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3.
- [5] 陈联俊. 关于“公民意识”的几个基本问题[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59-62.
- [6] 公丕祥. 法理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0.
- [7] 王岩,孙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意识的构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9):43-47.

Public Awareness of Citizen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ety Ruled by Law

XUE Guang-hua

(Graduate School,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 just makes the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a socialist country, there is still a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of some unsound policies and systems. But more importantly, most of Chinese people lack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hip, which is a barrier to the building of a society ruled by law. The root cause can be the traditional moral system and the un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refore, public awareness of citizenship can be increas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we advance market economy as the solid financial foundation, improv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s the political protection, communicate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legalism as a spiritual recharge, and build up citizens' society as the roo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 awareness. The paper aims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citizen awareness on a society ruled by law, their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solutions through unifying history and logic and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lso,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citizen awareness will be analysed from a social and logic perspective.

Keywords: citizen awareness; a society ruled by law; democratic politics

(责任编辑:李 军)